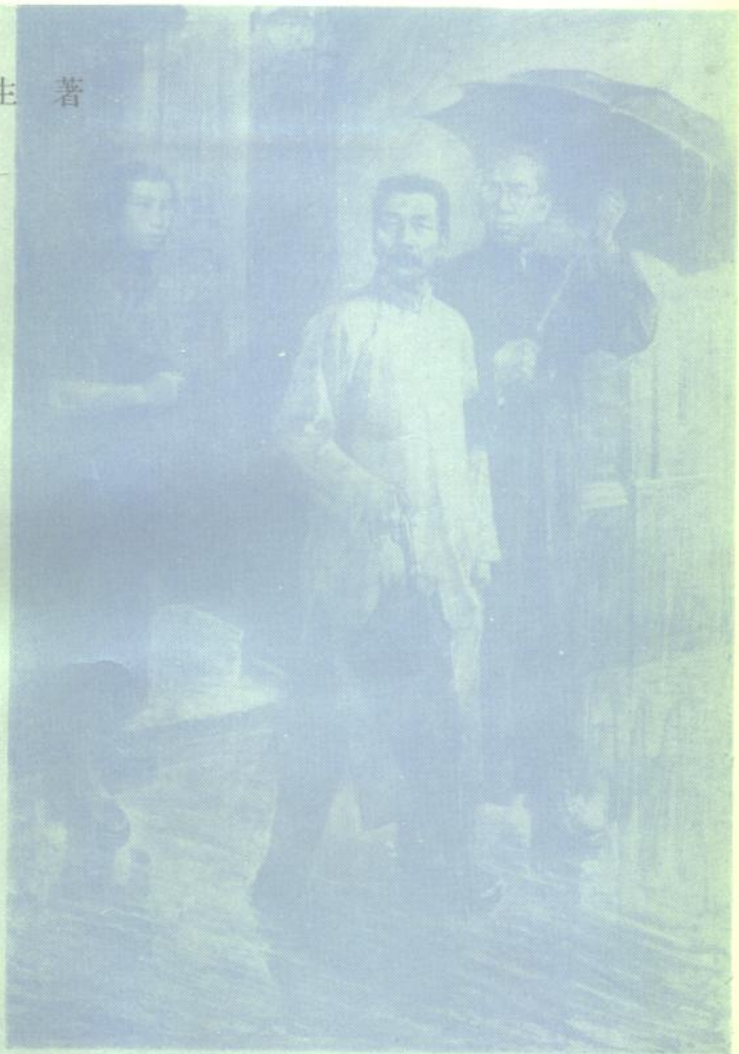


罗慧生 著



鲁迅与许寿裳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鲁迅与许寿裳

——从一个侧面看鲁迅

罗 慧 生 著

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封面题字 曹靖华

封面画稿 裘 沙

封面设计 潘孝忠

责任编辑 铁 流

鲁迅与许寿裳

罗慧生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125 插页5 字数129,000 印数10,001—5,000

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03·304 定 价: 0.59 元



魯 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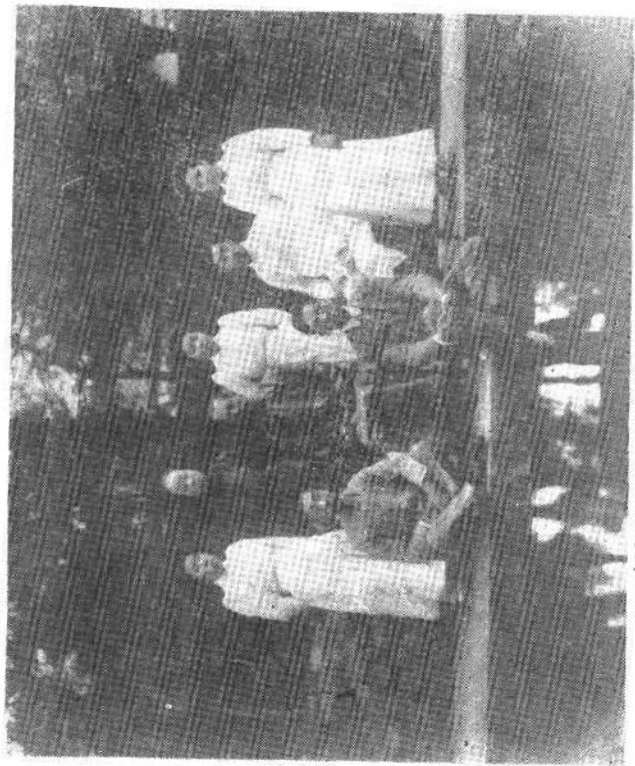
许寿裳



留学东京时拍摄。后左为鲁迅，后右为许寿裳。



1909年摄于日本东京。右一为鲁迅，左一为许寿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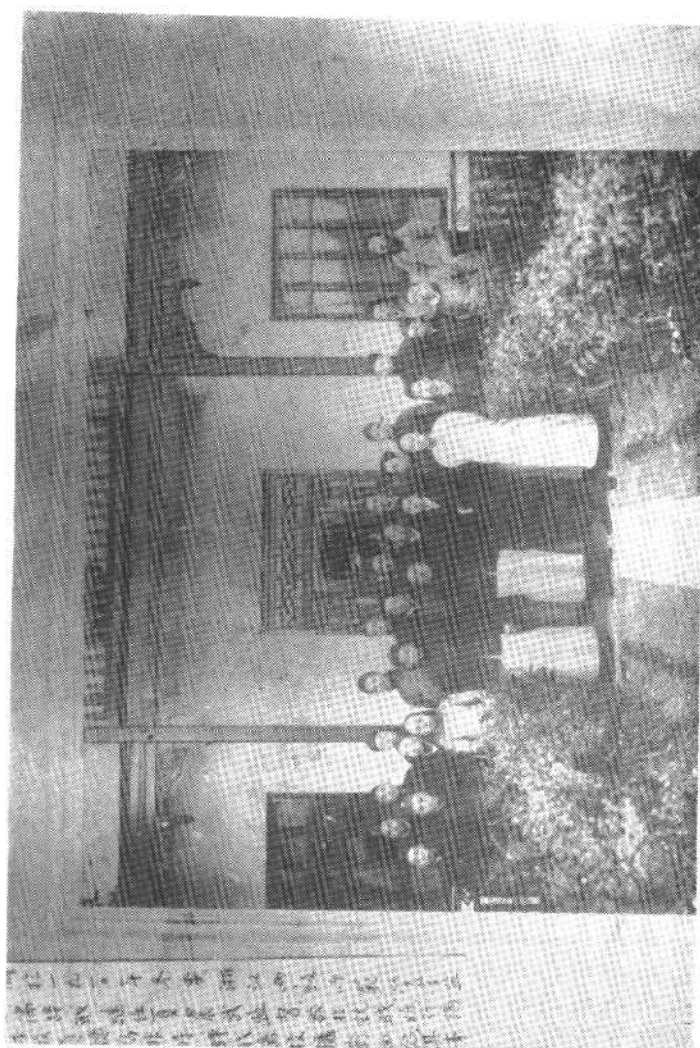
1909年鲁迅与许寿裳等摄于日本东京一医院。

左坐者为鲁迅，右坐者为许寿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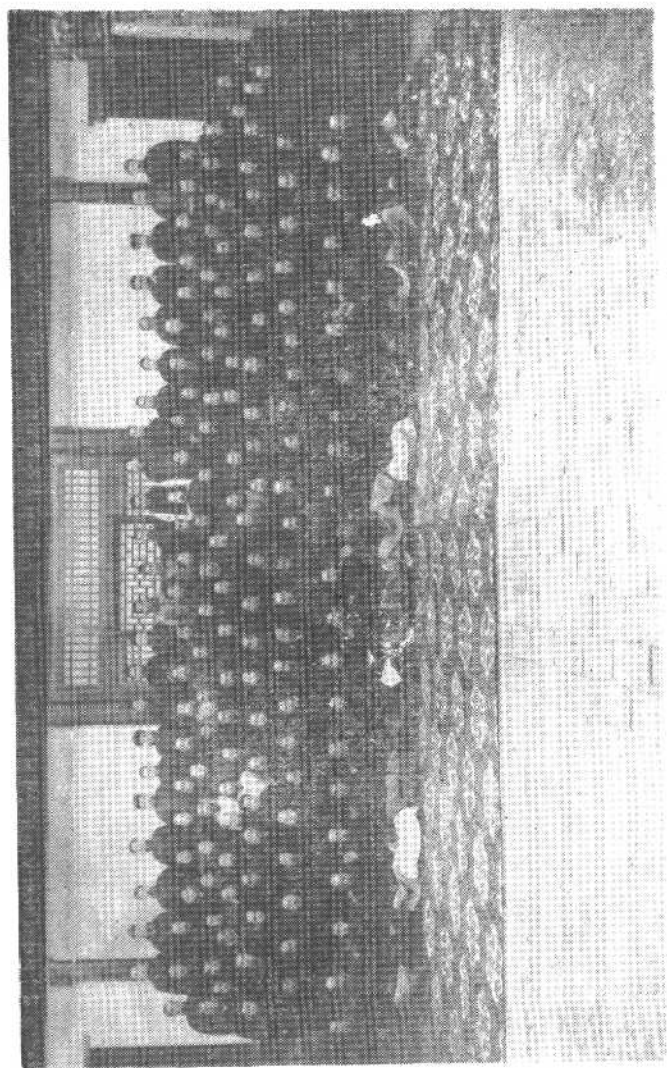


鲁迅于1909年归国以前与友人许寿裳、蒋抑卮在日本东京的合影。左坐者为鲁迅，立者为许寿裳。

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
范教员与浙江两级师范
胜利后合影于杭州“湖州会馆”
前排右三为鲁迅，后排右五为许寿裳。



“木瓜之役”胜利后与浙江两级师范教员合影，1909年摄于杭州“湖州会馆”。
前排右三为鲁迅，后排右五为许寿裳。



教育部全体部员合照。后排左三为鲁迅，前排正中为许寿裳。

序

我是一九二四年秋末冬初认识鲁迅先生的，第二年未名社成立前，大概是经过先生的介绍，我同许寿裳先生见了面。我知道他同鲁迅先生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他自己又和葛可亲，所以一见就留下很好的印象。一九二五年七月，北京有人创办《民报》，计划办副刊，鲁迅先生介绍韦素园去担任编辑，我在上面用“任冬”的笔名，发表翻译的《上古的人》。这个报只出半个月即被张作霖查封了。鲁迅先生劝我将译稿核校出单行本，我说最好能请人给校阅一下，先生立即说：“我去绑季葑的票！”季葑就是寿裳先生。许先生就我提出的疑难之处，校阅一过，由鲁迅先生将译稿还给我。我将译稿卖给上海亚东图书馆，得酬百元，连同鲁迅先生借给我的百元，解决了我上大学的费用。

鲁迅先生翻译《出了象牙之塔》时，在英文方面很得到寿裳先生的帮助，这种友谊的合作，当时就很被我们赞叹。《出了象牙之塔》是未名社印行的第一本书，所以寿裳先生对鲁迅先生的帮助，也就是对于未名社的支持，我们是十分感谢的。

一九二九年，我开始翻译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》，一

九三〇年夏完成。未名社无力印行，我当时又债台高筑，很想将译稿卖出去。我为营救一个朋友去上海，见到鲁迅先生，他说可找寿裳先生转托蔡元培先生想想办法，但也未必有效，姑且一试罢了。我去找寿裳先生，他立即请蔡先生写信介绍我去南京找叶某，叶又介绍我去找另一人，他当场就告诉我：“公事公办，无能为力。”但是我们还是很感谢许、蔡二先生的热情帮助。便中我也告诉寿裳先生，未名社还无力印行三十多万字的长稿，鲁迅先生一时也想不出办法，寿裳先生说，可以转请蔡先生试一试商务印书馆，并让我把译稿留下。商务买了这部译稿，先后在《世界文学名著》和《万有文库》中印行。去年有出版社约我修改译本重印，我原不肯，后来又听说有自俄文译的新本要出，我想就更不必费事了。出版社的同志仍劝我修改，并请方仲用俄文校一下，因为译文风格不会相同，一部名著不妨有不同译本。这个话自有道理，但我五十年前的译文确实很差，谈不上风格，不过为了对以前的读者赎赎前疚，并不负蔡、许二先生的帮助好意，我还在勉力修改这部旧译稿。

一九三〇年秋，我离开未名社，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。一九三三年秋，有一天我外出回来，见到一个来访者留下的字条，我立即到他落脚的旅店看他：曹靖华同他的妻女从苏联回来了。从他的来信，我知道他准备回国，但突然到来却十分意外，所以异常惊喜。第二天早晨，我陪他们到北京去，想先住到一个朋友家里，等候工

作。他只有两件行李，不大也不重，而拿行李的“青皮”，每件索价二元，大概看到他们是远道而来的人可欺；我多少算是老天津了，也没有应付他的本领，只好照索价付给他了，当然有点生气。在火车上付茶水钱时，我才发现装着为他们准备作生活费八十元的钱夹不翼而飞了。真是又好笑，又好气。从这点小事，可以看出那时候的社会是寸步难行的。除小事之外，还有大事呢，这就是他们的安全问题。那时候认为从苏联回来的一定是“过激党危险分子”，随时可能被捕起来，即使不被捕，找工作也十分困难。谁敢承担风险作介绍人呢？因为靖华在苏联时同鲁迅有经常的联系，许寿裳先生知情，我们便请范文澜同志设法安排靖华在女子文理学院教课，化名为曹联亚。寿裳先生到该校后一直保证曹的教席和安全，但是查问的人很多，他才将风声不利的情形告诉我。靖华想去上海卖文为生，写信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，先生认为上海可能更不安全，译著也很难维持生活，不如不动，寿裳先生便一口咬定曹联亚同曹靖华毫不相干，表现得十分镇静。一九四九年四月，我要离开台北时，同寿裳先生很亲密的一位戴先生，还问我曹联亚究竟是不是曹靖华，他说曾问过寿裳先生多回，所得的答话都是：“不是。”

一九三〇年秋，我的女师院同事孔若君（另境）被捕，我们多方营救无效。他先被囚禁在天津，以后被解送到北京。大概是若君家属请鲁迅先生营救，先生就写信给寿裳先生，请他托托汤尔和，并说用二人名义去托亦可。

那时候要营救政治犯，一是用巨款送贿，一是托达官贵人“说情”。汤大概是当时的教育部长。我知道后，曾去汤处几次，均不见，以后鲁迅先生又写信给寿裳先生，写介绍信给我去见汤，我认为只将信寄去，加以说明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些信起了作用，孔若君不久就写信对我说，如京津有两个有社会地位的人作保，他可被释放。

若君被释放后，就住在保释他的那位朋友家里。他到范文澜家里去谈天，很晚才回去，见到那位朋友家门口军警林立，灯火辉煌，知道出了事，便打电话给我，让我立即到北京。韦丛芜和我搭早车到京，若君在车站接我们，告诉我们那位朋友昨夜被捕了。我们立即到警察局找一个燕京的同学，他说案情十分严重，因为搜出了“新式炸弹”，发现了“秘密室”，查获了大批“共产党宣传品”。所谓“秘密室”和“共产党宣传品”，我心里有数，因为我每到北京，就住在那三间屋里，未名社的剩余书刊就存在有一扇穿衣镜通进去的另外三间屋。至于骇人听闻的“新式炸弹”是怎么回事，我很想从那位同学打听清楚。他说，不必忙问那些，你们先躲起来吧，因为宣传品牵涉到你们，已经去人到天津逮捕你们去了。我们躲起来，经一周的查问，才知道所谓“新式炸弹”，实际是制作化装品的小仪器，是一个熟人存放的，她给警察局写信说，报纸所宣传的“新式炸弹”，她愿在大会上公开说明是她留下的纪念品，绝非炸弹。那位朋友才很快地被释放了。若不是鲁迅和寿裳先生亲密合作营救，若不是若君及

时发现并通知我们，未名社三个成员可能因此丧生。他们三位都先后作古了，我不仅怀着感念之情，现在写起来还有余哀与悲愤。听说若君是在“四人帮”横行时含冤逝世的，详情我不大清楚。寿裳先生惨死的主要原因，却是因为他忠于对鲁迅先生的友谊。

一九四六年秋，我应寿裳先生之约，到台湾省编译馆工作。“二·二八”起义后，编译馆被解散，寿裳先生介绍我到台湾大学任教。在“二·二八”周年前夕，突然传来寿裳先生逝世消息，据说夜里被盗贼杀死的。我当时就认为不可信，怀疑是政治杀害，因为几年中寿裳先生写了不少篇纪念老友鲁迅先生的文章，而鲁迅是国民党反动派深恶痛绝的人物。也颇有人劝寿裳先生不要写，或写了先不发表，但寿裳先生坚持写下去，认为这是对鲁迅先生和后世应尽的义务。据说杀他的人因为编译馆解散失业怀恨，这完全是胡说。这个工人在先生家作杂活，生活绝无问题，先生还答应一定为他找工作，哪有杀他的道理？当时还有一种可笑的传说：先生被杀后，侦察的特务等在住所附近一处房屋里打麻将，忽然有一阵风从窗外吹进一片竹叶。特务们一看大惊，经研究推测，杀人犯一定在“新竹”，因为吹进的是一片“竹”叶嘛！这个工人是家住新竹的，所以就将他逮捕起来，宣布他是杀人犯。事隔多年，地名我记不十分确切了，但吹进了什么叶，与地名联系起来就破了案，这传说确是有的，我也记得很清楚。据妻所记，当时传说是“桃叶”，台湾有“桃园”这个地方。

不过有一件事是万分确切的：我有一个学生是很进步的，他的父亲在台北法庭工作，他告诉这个学生说，那个工人被捕后，他的姐姐去探望他，当然知道他是无辜的，法院防她闹事，向她保证说，不会杀她弟弟，以后生活绝无问题。可是不几天后，他们突然把这个工人枪决了，他姐姐当然事前毫不知道，大骂大哭一阵，当然也毫无结果。

鲁迅先生和许寿裳先生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，历时很久的。鲁迅先生说：“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，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。”许寿裳先生是鲁迅先生的老朋友之一，他们的友谊堪称交友的典范。罗慧生同志编写了《鲁迅与许寿裳》一书，很有意义，故我乐为之写序。

李霁野

1981年7月11日